

译者姿态理论对中华文化外译的解释力

——以梁社乾英译《阿Q正传》为例^①

汪宝荣

(杭州师范大学)

摘要: 本文认为,英国学者查尔斯顿最近提出的“译者姿态”理论对中华文化外译译者的决策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并提出如下假设:因其文化身份及向西方读者阐释中华文化的翻译目的使然,有着中华文化身份、从事中华文化外译的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往往体现出一种旨在寻求中华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本文对美籍华人梁社乾英译《阿Q正传》的个案研究验证了以上假设,但译者姿态理论的解释力也有限度。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heory of translatorial *hexis* recently developed by the British scholar David Charlston can account for certain decision-makings by translators of Chinese culture for Western audiences. It posits the hypothesis that a Chinese cultural honor-seeking bodily stance observable in certai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might be embodied in the translated text produced by translators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seeking to interpret Chinese culture for Western audiences. A case study of American-Chinese scholar George Kin Leu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u Xun's *A Q Zhengzhuan* can substantiate the above hypothesis. Meanwhile,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theory of translatorial *hexis* is somewhat limited.

关键词: 译者姿态; 中华文化外译; 解释力; 梁社乾《阿Q正传》

Key Words: translatorial *hexis*; Chinese culture export translation; explanatory power; George Kin Leung; *The True Story of Ah Q*

一、引言

晚清中国内忧外患,国力衰微,昔日的中华文化荣耀不再,甚至有“亡国灭种”之虞。在此背景下,梁启超、林纾、严复等有识之士意识到引进“西学”的重要性,大力提倡翻译并积极译介西方著作,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与此同时,陈季同、辜鸿铭等精通西方语言的中国人率先从事中国典籍外译,旨在向世界推介中国传统文化,维护中华文化的荣耀。马祖毅、任荣珍(1997: 703)认为,“如果他们不热爱祖国文化,也不会从事汉籍外译的活动”。显然,“热爱祖国文化”的不限于中国本土译者,可能还包括海

外华裔译者,但以上论点却揭示了迄今被国内学界忽略的一个重要翻译现象:从事中国文学文化外译的译者,往往本着其中华文化身份,怀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和自豪,在译作中力图寻求并彰显中华文化的荣耀,且他们的这种文化取向往往体现在其翻译策略中。

被柳无忌(Liu, 1972: 96)誉为“英译中国现代小说第一人”的美籍华人梁社乾(George Kin Leung, 1899—1977)就是这样一位译者。遗憾的是,梁社乾在20世纪30年代以“研究中国传统戏曲的权威”名噪一时(B. G., 1929: 613),这几乎遮蔽了他作为译者的身份。梁社乾20年代初来到中国,以英译苏曼殊和鲁迅的小说代表作确立了他在民国时期中国文

^①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翻译社会学视阈下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介模式研究”(15BYY034)的阶段性成果。

学外译生产子场域中的地位(Wang, 2017: 256—260)①。1924年,他翻译的《断鸿零雁记》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②。1926年,梁译《阿Q正传》复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当年及次年至少有6篇书评③,说明颇有影响。该书1927、1929年重印,1933年出修订版(戈宝权,1981: 20),后者又在1936、1946年重印,可见当年销量颇为可观。梁译是《阿Q正传》首个英译本,仅此一端,梁社乾也是厥功至伟的。但可能由于梁译本出版较早、译文呆滞生硬等原因,目前对其专门研究不多,主要见于汪宝荣(2015a, 2015b)、Wang(2017)。

英国学者查尔斯顿(Charlston, 2013)提出“译者姿态”(translatorial *hexis*)理论,希腊学者帕斯马兹(Pasmazi, 2014)丰富、发展了该理论④。本文认为,译者姿态理论对中华文化外译译者的决策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进而提出如下假设:因其文化身份及向西方读者阐释中华文化的翻译目的使然,有中华文化身份、从事中华文化外译的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往往体现出一种旨在寻求中华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以下以梁译《阿Q正传》为例检验该假设的有效性及其译者姿态理论的程度。

二、梁社乾及《阿Q正传》梁译本的出版背景

梁社乾原籍广东新会,1899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父母从香港移民到美国。梁社乾在美国接受教育,大学时学习戏剧和音乐。因其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背景使然,他不仅熟练掌握了英文和中文,而且始终抱持着中华传统文化。梁社乾读大学期间,其父过世,其母改嫁,于是他决定回国寻根,并谋求个人事业发展。凭借翻译苏曼殊和鲁迅小说站稳脚跟后,梁社乾转向中国传统戏剧英译与研究,赢得了“研究中国传统戏曲的权威”之名,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中国文化生产场域中的地位。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梁社乾回美国定居,业余从事中国传统戏曲演出,并研究中国古典园林、园艺,1977年卒于纽约(汪宝荣,2015a: 22—23)。梁社乾毕生

从事向西方译介传播中国文学、传统戏曲和文化的工作,热爱并抱持中华文化传统,并引以为荣,因此可算是具有中华文化身份的译者。

首先说明《阿Q正传》梁译本的成书过程及其目标读者,因为这些因素对译者选定翻译策略有着重要影响。梁社乾在翻译及出版前后与鲁迅通信,内容涉及请求鲁迅允许他翻译《阿Q正传》,鲁迅为他释疑解难、校阅译稿,梁社乾寄样书给鲁迅等(鲁迅,2005a: 563, 569—574; 鲁迅,2005b: 604, 648—649)。由于鲁迅仅“略通英语”(Snow, 1935: 43),且只用五六天就看完梁社乾寄来的译稿,以致没有发现其中明显的删削和增译,因此鲁迅自称“校正”译稿的实效值得怀疑。鲁迅(2005c: 400)评论道“至于《阿Q正传》的译本,我只看见过两种。法文的登在八月分(份)的《欧罗巴》上,还止三分之一,是有删节的⑤。英文的似乎译得很恳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说什么。只是偶然看见还有可以商榷的两处……。”鲁迅粗略比较了英法译本,对敬隐渔任意删节原文的做法表示明显不满。由此推断,鲁迅所说“英文的似乎译得很恳切”当指他认为梁社乾译得认真规矩,不像敬隐渔那样任意删改原文,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阿Q正传》梁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目标读者无疑包括在华外国侨民和学英语的国人,但因当时在华外国侨民数量有限,后者才是阅读主体。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英语日显重要,成为“一门事实上的辅助语言”,因而在对外通商城市兴起了一股“英语学习热潮”(Hill, 2011: 128—131),而商务印书馆在其发展初期以编写、出版教科书为主要业务,因此梁译本主要用作国人学英语的辅助读物。另有两条证据:一是梁社乾(Leung, 1926: v)在《阿Q正传》英译本译者序中指出,“本人意识到很多人会拿译文与原文对读,因此除了因两种语言文字差异太大而不能直译之处,我尽量贴合原文仔细翻译”;二是梁社乾(Leung, 1924: x)在《断鸿零雁记》英译本前言中指出“我原本打算以汉英对照形式出版这本书,以方便学英语的中国学生,因此翻译时小心翼翼地尽量紧贴原文,几乎是逐词翻译。”

① 布迪厄认为,文化生产场域可分为“大规模生产子场域”和“有限制生产子场域”(Bourdieu, 1993: 75)。本文据此提出以下假设:在民国时期的文化生产场域中,外国文学汉译构成大规模翻译生产子场域,而中国文学外译则构成有限制的翻译生产子场域。

② The Reverend Mandju [Su Manshu]. *The Lone Swan*.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4.

③ 其中3篇为中文书评,作者之一是郑振铎;另3篇为英文书评,作者均为在华外国人,其中1篇载美国《周六文学评论》杂志(*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具体书评内容参见Wang(2017: 274—277)。

④ 详见汪宝荣(2017)对查尔斯顿和帕斯马兹理论观点的综述。

⑤ 指当时在法国留学的敬隐渔所译《阿Q正传》法译本。

三、梁译《阿 Q 正传》翻译策略分析

通过文本比较分析发现,梁社乾采用了看似相互冲突的两种翻译策略:在墨守直译法的同时又有局部的删改。以下分别论述分析。

1. 总体策略:直译与异化

从整体上看,梁社乾确实“小心翼翼地尽量紧贴原文,几乎是逐词翻译”。如下例:

原文:他很想即刻揪住他,拗断他的竹筷,放下他的辫子,并且批他几个嘴巴,聊且惩罚他忘了生辰八字,也敢来做革命党的罪。(鲁迅 2006: 102)

梁译: He very much desired to seize him at once, break up the bamboo chopstick, let down his queue, and give him a few slaps on the mouth in the bargain, merely to punish him for forgetting his humble birth and destiny and for having the audacity to be guilty of the offense of becoming a Revolutionist. (Lu Hsun, 1926: 71) ①

将上述译文与原文一对照即可看出,梁译紧贴原文的字句、词序、句序和表层结构对译,不仅改变了原作流畅、洗练的风格,而且读起来佶屈聱牙、笨拙累赘。“他很想”被译作“*He very much desired*”,明显是逐词对译,因为正常的英文词序是“*He desired very much*”;“敢来做革命党的罪”被译作“*the audacity to be guilty of the offense of becoming a Revolutionist*”,不仅原句一字不缺全都照直译出,而且“罪”被重复翻译为“*be guilty of*”和“*offense*”。梁译的谨小慎微和僵硬累赘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在语言形式及结构上紧贴原文翻译,梁社乾还倾向于对中华文化专有词进行异化处理,以尽量保留这些词的文化异质性,如把“秀才”“举人”“翰林”分别音译为“*Hsiu-tsai*”“*Chu- jen*”“*Hanlin*”,且均辅以简注,如对“*Hsiu-tsai*”的注释是“*a scholar who has qualified for the governmental examinations in his district*”②(p. 99)。用音译(有的辅以注释)处理的文化专有词还有人物称谓“老爷”(Lao-yeh)、头衔“地保”(ti-pao)、诵念的佛号“阿弥陀佛”(O-mi-to Fu),甚至连人名都有整个音译的,如把“邹七嫂”译作“*Tsou Chi-sao*”。此外,译者还对某些成语典故采用了直译法(有的附注),如把“龙虎斗”译作“*this*

furious fray between dragon and tiger”(p. 42),“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译作“*How was it to be concluded that the loss of the old man's horse at the border country was not actually a blessing?*”(p. 15)。梁社乾偏重异化翻译,很可能考虑到以上中国文化指涉词(包括成语典故)在英语中没有完全对等的词语,但也体现了他尽量保留原作所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意图。

2. 隐蔽性策略:删削、增译、委婉化和净化

以上分析表明梁社乾似乎确实“译得很恳切”,甚至是循规蹈矩的,但事实上梁译对原文也有局部删削、增译、委婉化和净化处理。鉴于它们与梁译总体上的直译和异化相悖,且较为隐蔽,本文称之为“干预性改写手段”或“隐蔽性翻译策略”。第三章《续优胜略记》中阿 Q 与王胡比赛“捉虱子”一节是删节最严重的:

原文:阿 Q 也脱下破夹袄来,翻检了一回,不知道因为新洗呢还是因为粗心,许多工夫只捉到三四五个。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阿 Q 最初是失望,后来却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么多,自己倒反这样少,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呵!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然而竟没有,好不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狠命一咬,劈的一声,又不及王胡的响。他癩疮疤块块通红了……(第 79 页)

梁译: After Ah Q slipped off his tattered short lined coat, *Wang-hu's actions became irritating and Ah Q gradually lost his temper*, each of his impetigo scars coloring red. (p. 20)

原文中“捉虱子”比赛一节的具体描写(上例划线部分)被译者压缩编译成一个句子——“王胡的举动令阿 Q 恼怒,因此阿 Q 发脾气了”(译文斜体部分)。此外,还有细微的删削,如出自《左传》的历史典故“若敖之鬼馁而”(若敖氏全族以后没有子孙祭祀供饭,鬼魂都要挨饿了)被删去不译(p. 28)。

另一方面,梁译也有增译现象,最显著的两例出现在章节结尾。其一,译者把第五章《生计问题》的结束句“待三个萝卜吃完时,他已经打定了进城的主意了”(第 91 页)译成“*And so by the time he had devoured the three turnips, he had made up his mind to go to the city*”后,添加了“*where he remained for some*

① 以下译例出处同上,只注明页码。

② 秀才别称茂才,清代“专用以称府、州、县学的生员”(夏征农,1999: 2404),因此梁注“秀才指有资格参加本区官办考试的书生”并不准确。

time, passing through some unusual experiences.” (p. 46)。其二,在第八章《不准革命》结尾处,阿Q恨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想去告他的状,叫他“满门抄斩,——噻!噻!”(第106页),梁译又添加了一句“With such resentment filling his heart, Ah Q gradually snored off.”(p. 78)

最后,梁社乾还倾向于对猥亵之词或粗俗詈辞进行委婉化、净化或删除。例如,脏话“鸟男女”在小说中出现2次,一是“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第97页),二是“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第99页)。此处“鸟”与“屌”字相通,指男性外生殖器。梁社乾把两处的“未庄的鸟男女”分别译作“the men and women of Weichuang”(p. 60)和“the whole bunch of Weichuang, men and women”(p. 61),对脏字“鸟”做了净化处理。又如,被鲁迅称作“国骂”的詈辞“他妈的”在小说中以变体“妈妈的”“你的妈妈的”出现9次,在梁译本中要么被删,要么被委婉化处理成“you bad fellow”“you rascal”(p. 35, 78),或净化处理成“muttering unpleasantly”(p. 38)、“an unusually terrible state of affairs”(p. 39)、“too hateful”(p. 49)。再如,在第四章《恋爱的悲剧》中,阿Q跪下向吴妈求爱,口中连声恳求:“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第85页),被委婉地译作“Will you... will you...?”(p. 32),把阿Q粗俗直白的求爱语美化为文雅体面;阿Q对小尼姑说的猥亵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第82页)被删去,代之以“Ah Q... replied with an ambiguous quip”(阿Q用一句暧昧的挖苦话回答)(p. 25)。

四、梁译翻译策略新解:寻求中华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

汪宝荣(2015a: 33—35)结合民国中期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国内主流翻译规范、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因素,解释了梁译《阿Q正传》看似相互冲突的翻译策略,即在墨守直译法的同时又有局部删改。译者姿态理论则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视角。梁社乾决定回中国“寻根”,说明他从内心深处认同自己的中华文化身份;他到中国定居并谋求个人事业发展,进一步强化了他的中华文化身份。他初到中国,决定利用自己的语言条件翻译苏曼殊和鲁迅的小说代表作,显然抱着借此进入中国文化生产场域的意图。由于在民国时期的文化生产场域中,中国文学外译的性质是“有限的生产”,主要基于“符号资本的积累”运作,因此梁社乾从事翻译的目的主要是在场域中获取“一种公认的声音”和

“一种认可作家作品的资本(capital of consecration)。”(Bourdieu, 1993: 75)其次,一般情况下译作都是从出发文化进入目标文化,但《阿Q正传》英译项目在国内发起、实施,译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面向国内读者和在华外国侨民,因此事实上该个案中的“目标文化”既指出发文化即中国文化语境,也指外国人在租界营造的临时的西方文化语境。

在译者姿态理论视角下,我们对梁社乾采用的直译与异化翻译策略做出如下分析:

其一,译者伦理要求他必须关心原作与译本的对等关系。查尔斯顿指出,这是译者“寻求荣耀”的一种常规做法,只不过梁社乾走得太远,滑入了几乎逐句对译的极端。

其二,梁译本在国内出版,且主要面向国内读者,故此,到中国不久、想要在国内站稳脚跟的梁社乾必定会关心他在中国文化生产场域中的声誉。学英语的国内读者拿译文与原文一对读,便知译文是否忠实可靠。在这种情况下,梁社乾除了尽量紧贴原文忠实翻译别无选择。查尔斯顿指出,关心自己在场域中的声誉也是译者“寻求荣耀”的一种方式。

其三,梁社乾在翻译过程中及译作付梓前与鲁迅通信,把译稿寄给鲁迅审阅,这是促使他倾向于直译的不可忽视的外部压力。白话小说之父鲁迅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生产场域中声誉日隆,其作品颇有影响,因此对梁社乾来说,翻译鲁迅作品是一把双刃剑:译好了(忠实翻译)能为他迅速带来声誉(其运作机制颇似鲁迅调侃阿Q时所说的“托底有了名”),译坏了(胡乱翻译)则会遭人非难。处于多重压力下的梁社乾为了在场域内寻求荣耀、取得声誉,除了直译别无他选。

其四,梁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在国内出版发行,主要用作国人学英语的辅助读物,此即查尔斯顿所称“译本在目标文化的潜在作用”。梁社乾说得很清楚,为此目的他必须“尽量贴合原文仔细翻译”。在查尔斯顿看来,这也是译者试图“寻求荣耀”的一种表现。

最后,在文化翻译层面上,梁社乾倾向于采用音译、直译、注释等异化手段,这固然由于中华文化专有词难译甚至不可译,但也受到其文化身份及翻译目的的影响。梁社乾本着其中中华文化身份,怀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在选词措辞过程中力图寻求、彰显中华文化的荣耀,这是合情合理的。如上文分析所示,梁社乾在译文中试图保留的多为被他视作荣耀的中华文化信息,包括科举制度下的功名称号(“秀才”“举人”)、表明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的称谓和头衔(“老爷”“地保”)、佛教用语(“阿弥陀佛”)、

成语典故“龙虎斗”“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等。显然,梁社乾向西方读者阐释中华文化的翻译目的也促使他忠实直译这些文化指涉词。

总之,梁社乾的文化身份、翻译目的、关心他在国内文化生产场域中的声誉、译本用作英语学习材料、与鲁迅的通信联系等促使他以直译与异化为基本翻译策略,这种策略性选择体现了他旨在寻求中华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

对梁社乾采用的干预性改写手段分析如下:

其一,梁译本也面向在华外国人,而“捉虱子”这个场景既有写实的一面(当时穷苦人卫生条件差,不少人身上有虱子),也有夸张的一面(阿Q与王胡比赛捉虱子),但都会给人“中国人是肮脏的猪”这种负面联想,其性质无疑是“外扬家丑”的。许钦文(1956: 62)指出“当时一般人都是以为‘家丑不可外扬’的,鲁迅先生却大胆暴露了当时国民性的缺点。”然而,这在梁社乾看来是文化上不荣耀的,有损国人及中华文化的形象,因而予以删节。此外,他对历史典故“若敖之鬼馁而”采取省译的做法,很可能是考虑到其历史文化内涵复杂,如照直翻译会使译文变得艰深难懂,不利于英文读者理解,套用查尔斯顿的说法就是译者“用一种寻求荣耀的方式关心译本在接受情况”,因而决定删去不译。

其二,译者对猥亵之词、詈辞进行委婉化、净化或删除处理,其中有梁社乾个人审美情趣的影响,因为趣味高雅的译者会下意识地排斥粗俗文字,但也体现了他努力维护中华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即不想给外国读者留下中国人都是“粗俗、没文化”的不良印象。

其三,两处增译均出现在章节末尾,其功能相当于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回目结尾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之类说书人的套话。换言之,熟悉章回小说体例的梁社乾^①觉得原文收尾过急,言犹未尽,因此加以适当的引申发挥。由此可见,采取增译之法是为了彰显他以为的传统章回小说体例的优点,这也体现了他寻求中华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

总之,梁社乾在直译与异化翻译的掩护下采用较为隐蔽的干预性改写手段,一方面旨在向外国人捍卫中华文化荣耀,另一方面为中国人维护中华文化荣耀,其通过翻译寻求或彰显中华文化荣耀的动机昭然若揭,有时甚至不惜以冒险(含删改的不忠翻译会遭人非难)为代价。

^① 梁社乾(Leung, 1926: v)在《阿Q正传》译者序中指出“文言文是古老的经典书面语,不仅比白话文简练,而且更优雅优美。”笔者由此推测梁社乾有古文功底,很可能爱读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

五、结语

梁社乾回到中国“寻根”,是为了找回自己的中华文化身份。他通过翻译苏曼殊和鲁迅的小说代表作进入中国文化生产场域,是为了在场域中获取声誉,积累符号资本。梁社乾的文化身份、翻译目的取向、关心他在中国文化生产场域中的声誉、译本用作英语学习材料、与鲁迅的通信联系等促使他以直译与异化为基本翻译策略,这种策略性选择体现了他寻求中华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同时,他在直译与异化翻译的掩护下采用干预性改写手段,旨在一方面面向外国人捍卫中华文化荣耀,另一方面为中国人维护中华文化荣耀。以上分析表明,梁社乾采用的看似相互冲突的翻译策略——在墨守直译法的同时又有局部的删改——可用译者姿态理论得到有效的解释。同时,梁译《阿Q正传》这个案例验证了本文开头提出的假设,即因其文化身份及向西方读者阐释中华文化的翻译目的使然,从事中华文化外译实践、具有中华文化身份的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往往体现一种旨在“寻求中华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毋庸置疑,这一假设尚需更多实证研究和个案研究加以验证。

本研究还表明,译者姿态理论适用于分析具有中华文化身份的译者从事的中华文化外译实践,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指出译者通过翻译“寻求荣耀”这种文化取向和意图明确的行为本身限制了其应用范围。再者,该理论可用于解释译者为寻求文化荣耀采用的某些翻译策略,但不能用于分析所有的文化翻译策略。有的文化指涉词在文化取向上是中性的,不涉及文化荣耀,如阿Q“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此处“酒钱”译作“hush money”可谓功能对等,对这种情况译者姿态理论难以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参考文献

- [1] Bourdieu, P.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Ed. R. Johns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 [2] Charlston, D. “Textual Embodiments of Bourdieusian Hexis: J. B. Baillie’s Translation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The Translator*, 2013, 19(1): 51–80.

- [3] G., B. "Review of *Mei Lan-fang: Foremost Actor of China*." *Pacific Affairs*, 1929, 3(6): 613-614.
- [4] Hill, M. G. "Between English and Guoyu: *The English Student*, *English Weekly*, and the Commercial Press's Correspondence School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011, 23(2): 100-145.
- [5] Leung, G. K. "Foreword." *The Lone Swan*. Trans. G. K. Leung.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4. ix-xii.
- [6] Leung, G. K. "Preface." *The True Story of Ah Q*. Trans. G. K. Leung.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6. v-vii.
- [7] Liu, Wu-Chi. *Su Man-Shu*.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72.
- [8] Lu Hsun. *The True Story of Ah Q*. Trans. G. K. Leung.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6.
- [9] Pasmazi, K. "Translatorial *Hexis* and Cultural Honour: Translating *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 into Greek." *Remapping Habitu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Ed. G. M. Vorderbermeier. Amsterdam & New York: Brill & Rodopi, 2014: 73-92.
- [10] Snow, E. "Lu Shun — Master of *Pai-hua*." *Asia*, 1935, 35(1): 40-43.
- [11] Wang, Baorong. "George Kin Leu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u Xun's *A Q Zhengzhuan*." *Archiv Orientální*, 2017, 85(3): 253-281.
- [12] 戈宝权.《〈阿Q正传〉在国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13] 鲁迅.日记十四(一九二五年).《鲁迅全集》(第十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a.547-602.
- [14] 鲁迅.日记十五(一九二六年).《鲁迅全集》(第十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b.603-652.
- [15] 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c.394-403.
- [16] 鲁迅.《阿Q正传》.《鲁迅小说全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71-118.
- [17] 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 [18] 汪宝荣.《异域的体验——鲁迅小说中绍兴地域文化英译传播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a.
- [19] 汪宝荣.《阿Q正传》两种早期英译本描述性研究.《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2015b(1): 71-86.
- [20] 汪宝荣.寻求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浮生六记》林译本文化翻译策略新解.《外语学刊》,2017(6): 118-123.
- [21] 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 [22] 许钦文.《〈呐喊〉分析》.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